



# 目 录

- 一、为了二十六个伤病员 ..... 于锡智 (1)
- 二、回忆我区的医疗工作 ..... 王兰芬 (12)
- 三、王固庄自卫战 ..... 崔希尧等口述 于锡智整理 (19)
- 四、潍北海潮话古今 ..... 谭家正 (30)
- 五、刀笔落处尽惊魂  
——雕塑艺人张峨的故事 ..... 栾云洲 谭家正 (41)
- 六、潍县风筝 ..... 刘之堂 (71)
- 七、潍县民间砖雕 ..... 刘之堂 (79)

- 八、除叛英雄张英 ..... 区地名办公室 (84)
- 九、张英同志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断 ..... 张道路 (96)
- 十、邢明传略 ..... 贺思忠 (104)
- 十一、潍县早期的女党员王金华 ..... 管清汉 (115)
- 十二、水利专家宋文田 ..... 区史志办公室 (120)
- 十三、潍县新学先行者——徐画三 ..... 徐文修 (124)
- 十四、大华染厂的奠基人——张干臣 ..... 区工业志办公室 (131)
- 十五、民间讼师于伦秀二、三事 ..... 区史志办公室 (136)

## 为了二十六名伤病员 于 锡 智

大概由于职业的原因，每谈论起医疗工作，我总离不开“一切为了伤病员”这句口号。一讲到这句话，脑海中就浮现出解放战争中的一九四七年，我在潍北独立营卫生班带领二十六名伤病员转战半年多的情景。

### 敢 与 敌 人 巧 周 旋

这年的四、五月间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向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叫嚣声中，顽八军李弥部由潍城向烟台推进，占据了烟潍公路两侧的大部地区，至八、九月份，控制了潍北全境。

我潍北独立营化整为零，在百余里的潍北平原，开展游击活动，机智巧妙地打击敌人。

为便于部队机动作战，在伤病员无法向西海分区医疗所转送的情况下，营里决定，由我

(当时任卫生班长)和军需助理员张英臣同志(人们习惯称他张军需)负责，并抽出五名卫生员协助，带着二十六名伤病员，离开部队，单独活动在潍北一带，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，负责完成对伤员的护疗任务。

接受任务后，我深感责任重大。在卫生所工作，领导叫干啥就干啥，无忧无虑，可一旦离开部队单独执行任务，就象幼小的孩子，离开哺育自己的母亲那样，觉得无依无靠，艰难极了。

那时敌人非常疯狂，四面出击，寻找我军决战。而眼前我们这支小分队，转移时，有四名重伤员得用担架抬着，五、六名下肢伤的得靠人搀扶着。三十来个人挤到一块，目标不小，行动又缓慢。说自卫能力吧，只有我和张军需每人一支手枪，共二十粒子弹，一旦遇到敌人可怎么办呢？

幸好张军需还懂点军事常识，行事又沉着老练，使自己感到主壮些了。还有一个叫李尔忠的伤员是党员，俺三人为一个党小组，遇事就小组商量。

张军需平时腼腆的像个大姑娘，可研究起问题来，他善于动脑筋，在任何困难面前，都能想出对付敌人的道道来。研究我们的行动方案时，他说“咱要是和敌人硬拼，那是白送命；唯一的办法，是要斗智。遇事多琢磨，处处棋高一着，才能战胜凶恶狡猾的敌人。”

从此，我们便开始了与敌人巧周旋的战争生活。

首先尽量避开敌人。我们分配卫生员张文奎同志作侦察工作。每到一地，先找为我军传递消息的情报员，了解敌人进攻动向，敌伪人员活动的情况和我军的作战消息，然后研究我们的转移方向。为防止敌人发觉，几乎天天转移，有时一天换几个地方。因活动地盘较小，向北几十里是荒原海滩，我们经常与敌人保持十到二十里的距离。有时也故意制造些在一个地方住几天的假象，使伤病员略加休息，趁夜深人静时又转移到安全地方。这样，一会西，一会东，一会南，一会北，与敌人天天捉迷藏，使敌人对我们的去向摸不着头脑。

当然，军情变化多端，也有和敌人碰到一

块的时候。

一次，我们转移到潍北的横里路村时，忽然得到消息：大约有二百多敌人从南边开来，离村只有四、五里路。横里路以北一片盐碱荒地，十几里内无别的村庄，既无青纱帐可掩护，又无沟壕、树林可隐蔽，只有离大村不远的东北面一个高坡上，住着四、五户人家。这突然的情况，使伤病员们有些惊慌，工作人员也急的团团转。有人直接地提出：“现在躲没处躲，走没处走，咱有二十发子弹，每人再找把菜刀，豁上百十斤，和敌人拼了算啦！”

张军需察看了地形，简要地和大家作了商议，又风趣地给大家讲了诸葛亮用“空城计”吓退司马懿几十万大军的故事，要求大家坚定、机智、勇敢、沉着。他站起来高声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咱要学学诸葛亮。敌人要来大村，咱们先到高坡上那几户人家去。大家不要怕，看起来敌人是骄横的，但他们也是愚蠢的。他们不会想到解放军的战士敢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。话又说回来，万一敌人发现了我们，死拼也不晚。”

张军需的一席话，使大家平静了下来，随之我们迅速地进行了转移。不多时，敌人也进了横里路村。进村后，他们捉鸡、抢羊、打骂群众，折腾了两、三个钟头。也可能他们的“战利品”抢够了吧，对高坡上这几户人家，果真就没有在意。敌人撤走了，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们高兴地互相捶打着，有的还伸出大拇指，称张军需智慧广、办法多。

有时，敌人前面刚走，我们就后面进驻。这样看起来，有点冒险，但在特定的条件下，那些看起来危险的地方，而往往却是很保险的。

一天，我们转移到高里以北的一个小村，正赶上一户老乡死了牛卖牛肉，张军需考虑到大家已几个月没闻着肉味了，就买了些肉分给大家包水饺改善生活。最后一锅水饺还没熟，站岗的同志跑来报告，在村南二里多地的地方发现了敌人。同志们立即将水饺捞到碗里，按照事先的部署，急而不乱地顺着一条水沟撤走，有的边走边吃。这时，敌人还搞起了所谓火力侦察，胡乱放了几枪。一位爱开玩笑的伤

员说：“看，咱们吃水饺，敌人放鞭炮，真象过年一样。”这样，我们安全地又进驻了敌人刚撤走的一个村子。

## 意 志 坚 强 渡 难 关

当时，我们几乎天天行军，少则十来里，多则几十里。路程不算远，可对伤病员来讲，是一个不小的难关。

工作人员抬着担架，背着行装。伤病员互相搀扶着，一步步往前挪动。特别那些有下肢伤的伤员，一拐一拐地走着，头上的汗珠一个劲地滴，每走一步都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

记的有一位姓王的小伤员，大腿被子弹击成盲管伤，转到我们这里时，伤口已开始腐烂。我给他取子弹时，因没有麻药，只好狠着心，用钳子硬将弹头拉出，痛的他牙咬的吱吱响，脸上渗出豆粒般的汗珠。

刚做完手术，就要行军。我安排担架给他，可他说：“坐那玩意不舒坦，不如骑马呢！”一听这话，我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骑马？好口气。”可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马，还不有

的是。”他边说，边去找来一条木棍，用小刀修了修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这‘马’不错吧？”

他不上担架，自己硬要拄着棍子走。我犟不过他，只得让他试试看。他一拐一拐地走的倒不慢，可一会就满头大汗。我又劝他上担架，他还是坚持说：“不用，这匹‘马’挺好使的。”就这样，他一直坚持着，坚持着……“小王的伤这么重却能坚持走，咱不能掉队！”“小王是好样的，咱们要向他学习！”伤病员们互相鼓励着，走的更快了。

敌情更加复杂，我们需要向寿光北部转移，这不仅使大家行军疲劳，生活上也带来了更多的困难。

一次，连续三天，每天行军三十里以上，伤病员累的要命，刚想坐下休息一会，又发现敌情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再往前走。

几天得不到睡觉，睡得要命，一位让人搀着走的伤员，走着路睡着觉。只见他双眼紧闭，双腿仍旧向前迈着，还不时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鼾声，引得大家直笑。

当时，又正处夏季，老天爷也好像有意和

我们作难似的，白天太阳象团火，烤得头脑发涨。

走到漫洼之中，前无村后无店，筹集不到粮食和开水，大家一两天没正二八景的吃、喝了，肚子饿的咕咕叫，嘴唇干的起了燎泡。

这时，我只好把两瓶准备给伤员服药用的开水拿出来，又取出了一直舍不得吃的六个红高粱窝窝头，叫每人都喝口水润润嗓子，吃点干粮垫垫饥。可是，水瓶从排头轮到排尾，都说：“这水真甜哪！”瓶子里的水却老不见少。没办法，我只得在瓶子上画个记号，一个一个地看着喝，又强逼着每个人吃下块窝窝头。

这点享受的滋味，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中艰苦生活的人才能体会到，真比平时会餐还美的多。少喝了点、吃了点，大家的精神头来了，我也说：“同志们，敌人不让咱休息，咱还得走！”大家说：“走！”立即站了起来，迈着象是灌了铅的双腿，继续向西北洼走去。

## 千方百计寻药源

卫生所配发给我们的那点磺铵类药很快用

完了，伤员的伤口发炎化脓，又加上行军中喝生水，闹肠炎的多，治又没有药，真使我这个卫生班长苦脑极了。

我召集大家开会，让大家共同想想办法。刚讲完要研究的议题，被称为“机灵鬼”的卫生员韩风源说：“班长，我讲个故事吧？”一听，我有些反感：“故事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药用，在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先别开玩笑了吧。”

小韩笑笑说：“我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灵丹妙药呀！”他一本正经地讲了：三国时候的华佗，在琼林寺学医两年，临走时问他的师父沿化道人，怎么给没钱的穷人治病。沿化道人叫他记住四句话：“药草到处有，就靠两只手，人人是师父，处处把心留。”华佗记住了师父的话。他不光是个外科行家，还给穷人用三月的蒿子治好了黄病，用墙上的青苔治好了蜂、蝎蜇的病人呢。”

小韩讲的故事，使我们开了窍。向群众请教些土方，找些土药材，确是当时最好的办法。

为求方找药，我们走访了不少乡亲。这个说，这种偏方治外伤好；那个说，那种偏方治内伤挺管用。一位六十来岁的大娘说：“那年俺当家的砍高粱伤了腿，因没钱请先生，拖拉的伤口烂了，一个劲地流脓血，多亏俺娘家哥哥打听了个偏方，说把块胰子（肥皂）切碎，熬成膏，敷在伤口上，连上了几次，个把月上，伤就好了。”一听，大家乐了，决定采用这个偏方试试。

那时，就是找几块肥皂也不容易。打听了几个庄，得知有户在外面干事的回家捎回几条肥皂，我们便托人买了些来。

照大娘说的办法，我们熬了一盒肥皂膏，换药时，先使用食盐水浸泡的棉球清疮，将肥皂膏涂在用蚊帐布制的纱布上，糊住伤口，再用老粗布做的绷带包扎好。为了增强治疗效果，我们坚持双管齐下，想方设法给伤员增加营养。卫生员到海边捕捉些小鱼、蛤蜊之类，来给伤病员调剂“美味”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民鱼水情，乡亲们为了子弟兵，宁愿自己吃糠咽菜，把省下来的好吃的送给伤病员吃。说

来也真奇，土法治疗加营养，伤员的伤口一天一个变化，还好的真快呢！

转眼到了十月份，我们驻到了寿光县北官庄附近的一个小村。一天，我和卫生员刘维布去河边洗敷料，忽见一军人骑着紫红大马急驰而来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营长的通讯员杨洪宇同志。他说：“打听了若干天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找到了你们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敌人已经南撤了，营长要你们返回潍北营部驻地——蔡家栏子村。”

同志们听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，都高兴的跳了起来。

经过半年多的周折，我们又胜利地回到了部队。当首长和战友们列队欢迎我们，副营长张景美当众宣布给我们嘉奖时，每个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。

二十六名伤病员，除三名伤势重未愈转西海分区医疗所继续治疗外，其余同志休息了几天，分别回到了各自的连队。

## 回忆我区的医疗工作

王 兰 芬

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前夕，我区的卫生医疗工作，从无到有，由小到大，在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。许多从事医疗工作的老同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历尽艰难困苦，赢得了胜利的今天。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追溯往事，历历在目，温故知新，使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，以期后人从中得到教益。

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文化侵略的罪恶目的，于一九〇二年，美国人以传教为名在我潍县城东建筑了医院。因为房舍多是楼房，人多是外国的，群众称之为“洋楼”。当时，他们发挥西医之特长，治疗“梅毒”、“黑热病”等中医难以治疗的病症，疗效比较显著。尤其他们能作腹部手术，更是中医望尘莫及。因此，群众得了病，就要送“洋楼”。然而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，穷苦老百姓很难踏上这座“洋

楼”的门槛。按他们的规定，不管病情轻重，要进院必须先交押金，再订生死合同。押金要的很多，医疗费用一百元，就得先交二百元，等病人出院时，余退少补。生死合同的主要内容：患者自愿来院请求治疗，如在治疗期间死亡，院方该不负责。合同还得病人的父母或族长签字划押。“生死合同”成了医护人员的“护身符”。有的病人，就是因医护事故而造成死亡。如一九二〇年春季，门诊有个患梅毒的轻病号，由美国护士给注射六〇六针剂，注射后有反应，不到十分钟就死去了。这是明显的责任事故。当时院方电告县政府：“院里有个病人，病重死亡，不知家乡住处，应如何处理。”答复是“就地埋掉”四个字，草草了事。“洋医院”竟是如此伤人害命，旧政府崇洋媚外的奴才相也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医院，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因而也起了沟通医术、培养人才的作用。外国人远渡重洋来我国行医，由于缺少人手，不得不就地招收学徒工。徒工们是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，目睹“洋医生”们的罪孽，谁不为之痛心，谁不为

之慷慨！因此，学徒工们发愤学西医，好为父老兄弟解除痛苦。平日，他们对每个病例的病源，发病时的表现，以及用什么药物治疗等等，都仔细研究，学习了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几年之后，便辞职回家，自己开起药房来。我区的西医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当时有丁梦交、张范五、孙传文等，分别在丁家小河和固堤以及昌邑的柳疃等村开设医院。相继又有崔家官庄的隋兆祥、隋寿三、崔少南等，由浙江省巡溪医学院毕业回来，也在潍北开设医院。及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，这些医院，除受条件限制不能作腹部手术之外，其它病症的医疗效果，都不低于“洋楼”。这不仅为病患者解除疾苦，更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万恶的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，妄想用极端残忍的恐怖手段征服我们，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，是吓不倒、杀不绝的。敌人的残暴，更激发了英雄军民的顽强斗志。我区的医疗工作，也和其它工作一样，在当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，战胜重重困难，坚持了下来，为人民